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孙悟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81108-176-8

I. 汉… II. 孙… III. ①汉族—宗教文化—文化交流—藏族②汉族—宗教文化—文化交流—蒙古族③藏族—宗教文化—文化交流—蒙古族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1158 号

## 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

---

作 者 孙悟湖

责任编辑 李 劼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176-8/B·25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孙悟湖博士所著《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一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花数年时间补充拓展而完成的，立意新颖，内容丰富，从民族关系史和宗教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令人回味的汉、藏、蒙交往的盛事，总结三个民族文化互动的经验和智慧，意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和多元通和文化生态模式提供有力的论证，以便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这是很有意义的。中央民族大学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哲学与宗教学系的民族宗教学学科建设和多民族师生的融洽相处，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动力。他是蒙古族青年，又长期生活在北京，对蒙、汉文化较为熟悉，在大学受过哲学理论的系统训练，在研究生期间又学过藏文、藏传佛教和宗教学，有着探讨这一课题的良好素质。他刻苦钻研，又虚心向周围专家学习，终于结出学术硕果。

国内外学界对汉、藏、蒙古三族文化的研究，成果颇多；有些论著研究蒙、藏关系，也有论著谈到汉、藏关系，但直接以汉、藏、蒙古三族文化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则属罕见。本书在研究范围上的开拓是它的重要特色。在具体的研究上，作者做了许多可贵的努力：其一是视野和方法的更新，从传统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的角度转到哲学、宗教学、文化传播学的视域，在论述三族关系史时着重于考察文化关系史，在考察文化关系史中又突出研究宗教文化关系史，并用很大篇幅论述三族在佛

教哲学上的沟通、对话、互摄，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在三族的文化交流中，宗教信仰和文化是主渠道之一；其二是多层次地切入，形成立体化的结构，有思想理论的层面，有政治制度的层面，有学者、僧侣的层面，有民间习俗的层面，有文学艺术的层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其三是引证的资料翔实丰富，有史籍、专著、论文、译著，还有藏、蒙古文名著和若干日文著作，可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来做这个课题，并不急于求成，所以写得比较详细具体；其四是抓住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成分，即儒、佛、道三教，阐释三家的共生相摄和辐射过程对三族文化交流的影响，这是多民族文化能够既通且和的思想基础。

这部书在为社会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民族文化史信息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希望他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做下去，为推扬多元和谐型的中国文化模式创作出新的成果。

牟钟鉴

# 目 录

序	(1)
前言	(1)

## 上篇：蒙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

第一章 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	(2)
一、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背景	(2)
二、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过程	(7)
三、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意义	(43)
第二章 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	(51)
一、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	(51)
二、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信仰状况	(55)
第三章 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的内在紧张	(62)
一、佛教取代苯教的背景与藏传佛教取代萨满教的背景	(62)
二、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冲突	(72)

## 中篇：汉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第一章 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上） ——唐代及其以前汉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考	(82)
一、唐以前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82)

---

二、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93)
第二章 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中)	
——宋、元时期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13)
一、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13)
二、元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30)
第三章 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下)	
——明、清、民国时期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43)
一、明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43)
二、清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52)
三、民国时期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58)
第四章 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上)	
——唐代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66)
第五章 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中)	
——宋代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198)
第六章 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下)	
——元代汉藏学者、僧侣层面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	(206)
一、儒士、道士与藏传佛教僧人的交流 .....	(206)
二、汉地佛教僧人与藏传佛教僧人的交流 .....	(224)
下篇：蒙汉宗教思想文化交流	
第一章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	(258)
第二章 蒙汉宗教政策的交流 .....	(273)
一、吸收借鉴儒家的一系列治国方略 .....	(273)

---

二、对汉地佛教和道教的推崇与利用·····	(282)
第三章 蒙汉宗教观念的交流·····	(289)
一、蒙古族的天神观与华夏传统宗教的 天神观之比较·····	(289)
二、蒙古族的天神观吸收借鉴汉族天神观的部分思想 而演变为重伦理的宗教·····	(298)
第四章 蒙汉宗教礼制的交流·····	(305)
一、吸收借鉴汉族的礼乐制度·····	(305)
二、借鉴汉族的祭祀制度·····	(309)
参考文献·····	(322)
后记·····	(335)

## 前 言

2006年2月24日，再现藏、蒙、汉团结和睦的影片《月圆凉州》首次在联合国放映，并赢得了广泛赞誉。这一现象说明，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凉州会谈，用宗教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和睦的做法，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认同和赞许。那么，追溯历史，探究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互动的关系，再现三个民族间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史实，考究民族间能够和睦相处、团结协作的因子，为建立现代新型民族关系提供智力支持，无疑意义深远。汉族、藏族、蒙古族从文化上讲，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极富个性的子文化体，三个子文化体之间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在宗教领域中有着影响深广的演绎。因而研究、澄清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史实，理顺汉族、藏族、蒙古族三者在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中的关系，摆正其位置，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理论提供具体的论证，为华夏传统宗教的连续性提供明证，为今天制定民族宗教政策提供借鉴，为多民族文化交流研究的方法论提供新的视角，是本书的写作缘起。

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类：其一，史籍类，包括与本书论题相关的各朝代的史籍、人物传记；其二，论著类，主要指与本论题有关的富有理论创见的专著、论文；其三，民族文字类，包括与本书相关的藏文、蒙古文字资料；其四，其他类，包括考古、游记、笔记、野史、碑铭等；其五，外文类，包括一些英文、日文资料，由于笔者的外语水平所限，这部分资料的运用还远远不够。在使用资料的过程中，对于资料的来源、真伪，亦曾做过力所能及的辨别、筛选、考证、探究。

本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前辈的研究成果多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从哲学、文化传播学、宗教学的视角研究本课题还显得不够；随着敦煌学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此前的研究也显出了缺憾：如对课题的深层文化背景透析不足，将课题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之高度进行综合研究还显欠缺。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方法将汉藏、汉蒙、蒙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诸如汉藏佛教文化之交流及相互影响，汉地儒家思想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汉地道教文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对儒家、道教等的政治地位的影响，汉地原始宗教与藏地苯教的异同、源流比较、汉蒙宗教礼制的交流，汉蒙宗教观念的交流，汉蒙宗教政策的交流，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的冲突等问题进行历时性的回顾与系统的反思。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高度，以哲学、宗教学、文化传播学为视角，以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时间为线索，以宗教思想交流为中心，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相统一为方法，力图再现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原貌。

本书以汉、藏、蒙三个民族互相组合而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蒙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主要从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包括传播的背景、过程、意义，从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和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信仰状况上分析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的内在紧张等论题进行论述。

中篇为汉藏宗教思想文化的交流，主要从汉藏民间层面、汉藏学者、僧侣层面等角度探讨汉藏宗教思想文化的交流。

下篇为汉蒙宗教思想文化交流，主要分析蒙汉宗教政策、蒙汉宗教观念、蒙汉宗教礼制之间的交流。

# 上篇：蒙藏宗教思想 文化交流研究

元代以前，蒙古族和藏族间已有非官方的交流。公元 1247 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阔端的“凉州会谈”，正式揭开蒙藏关系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新篇章。从此，开始了蒙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不仅藏传佛教取得蒙古官方的崇敬，在元代得到了新发展，对蒙古族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藏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也深刻地影响了蒙古族的文化；而在蒙古帝国政权的扶持下，藏传佛教萨迦派取得了空前发展，其他宗派的发展却受到相对抑制。蒙古族萨满教作为蒙古族的传统宗教，必然会对藏传佛教的传入有所反应，但由于蒙古萨满教的主要势力都在民间，官方又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二者在官方的势力相差悬殊没有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而是在冲突中萨满教做了理智而又见机的让步。萨满教在民间有深厚的基础，但藏传佛教又没有深入民间，因而没有形成交流和对抗局面。元代以后，经由俺答汗和索南嘉措的再次经营，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四世班禅的接续努力，蒙古学者的不懈追求，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族地区逐步发展壮大，遂成为蒙古民众的主要信仰和蒙古族的主流宗教文化。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与各代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等原因是分不开的。在传播过程中，主要可分六个时期：一、蒙古帝国以前及蒙古帝国时期；二、阔端与萨迦班智达时期；三、忽必烈与八思巴时期；四、忽必烈以后至元朝灭亡时期；五、俺答汗与索南嘉措时期；六、清朝时期。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对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一、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背景

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背景与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是一脉相承的。

政治背景。佛教在松赞干布之时传入西藏，经过赤松德赞、赤热巴巾两王的发展和建树，藏土的佛教已初具规模，此期被称为“前弘期”。然而，佛教一传入藏地，就受到藏族苯教的抵制。佛教和苯教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冲突，最后朗达玛灭佛，佛教在藏土几乎是湮灭无余。后经下路安多和上路阿里两路弘传，佛教又在雪域藏土传播开来。佛教和苯教经过斗争转入融合，遂发展成与印度佛教稍有区别的藏传佛教，历史上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的传播与西藏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后弘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这种斗争持续一百多年，最后分裂

为几大集团，呈现割据局面。长期的刀兵相见，黎民苦不堪言，集团首领们也都矢尽道穷，无力再战。于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和寻求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思想，便成为当前所必需。在征战中，佛教的火种得以燃烧，重新在藏地弘传。佛教在传播中也在追寻统治者的支持。在这种寻求与追寻中，奠定了藏传佛教产生不同宗派的基础。社会的稳定，使西藏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兴起了很多封建农奴庄园，一些封建农奴主在寻求新思想的支持时，选择了佛教。但当时有些邪教打着佛教的旗号招摇撞骗，他们把蹂躏妇女作为成佛法门，以砍杀人头为超度手段，还修习“炼尸成金”之术，<sup>①</sup>致使很多人对佛教产生疑惑之心。为了纯净佛法，稳定社会和人心，一些封建农奴主便派遣僧俗弟子去印度或克什米尔留学，修习佛法。这些留学人员饱学显密经论而归，有的还请来印度或克什米尔的高僧或译师来藏地弘法。这样，佛教在雪域迅速发展，并产生很多宗派。各宗派的名称有取本土之名的，有按照所请教的导师取名的，也有向印度班智达请教而以此教授取名的。如萨迦、觉朗、香巴、止贡等派是按本土之名而取的；噶玛、布鲁等派是按导师之名而取的；噶当、大圆满、大手印、希解等派是按教授之名而取的。<sup>②</sup> 12世纪中叶，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觉朗派、希解派已基本形成。这些教派或为一个封建集团，或依附于某个封建集团，于是形成藏地的封建割据局面。这种割据局面互不统属，大大削弱了西藏抵御外族侵略的实力。正如意大利学者图齐在他的《西藏画卷》中所说：“济美多吉的记述（译者按：指《蒙古喇嘛教史》）很重要，它证明西藏此时已经失去了统一，被某些宗教或世俗首

<sup>①</sup> 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sup>②</sup>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土观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54—55页。

领所分割，这些人各自在不同的地区依恃继承或当选得来的权力进行统治，但一旦有需要或全部地区利益遭受威胁时，则在共同协议的基础上决定和战事宜。自然这种会议也得承认某个最高权力，能够调和不同意见，能够劝说与会的人们接受一个解决方案的建议。”<sup>①</sup> 这里说西藏当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不相统一是实，但各派之间力量的均衡以及佛教教义的“戒杀、熄争”的思想又牵制了各教派的壮大，故不可能出现一个能统一各派的大教派。而每一个教派欲谋求发展，非寻求政治靠山不能。

12世纪后半期，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在领袖铁木真的率领下，经过几年的征战，于1206年统一了漠北，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铁木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成吉思汗的视野逐渐扩大，他没有把眼光局限在蒙古高原，而是放眼世界，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于是东征金国，西讨西夏，南侵南宋，北收北亚，横扫花剌子模，远征欧洲，遂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蒙古汗国。蒙古汗国在扩张过程中，雪域藏土必然要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之中。不过藏地广阔而险要，靠征战取得并非易事，但当时蒙古帝国的强盛势头与藏地的封建割据局面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蒙古军队屡战屡胜的声威、屠城的恐怖，大有“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势。况且藏地是战是降，利弊截然相反。战，虽有地利之便，而无天时、人和之优，且胜负已判；降，名义上是版图纳入蒙古帝国，实际上是藏传佛教的发展、壮大——政治上有了靠山，经济上有了施主，信徒增加，影响扩大。双方经过反复衡量，最后达成一致。蒙古族统治者因为藏土地域辽阔，地形险要，不好治理，莫若“因其教以柔其人”，从而达到对藏地的有效治理，故而接受了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萨迦派也得以凭蒙古人之威对西藏进行统治

<sup>①</sup> [意大利] 图齐著：《西藏画卷》。

以及对其他教派的统领。基于以上政治因素，蒙古族统治者与藏传佛教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蒙古族找到了治理西藏的代理人，藏传佛教找到了政治靠山。

经济背景。12世纪，蒙古汗国崛起于漠北，频繁的征战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因此，蒙古族统治者最初开拓疆土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财物、赋税和牲畜，其中财物和赋税是最重要的。但到后来，开拓疆土已经不仅是为了得到财物和赋税，更重要的是实现理想的必经之路，欲建立一个雄霸世界的超级帝国。对吐蕃的经略显然属于后者——欲辟土地，朝诸侯，莅中国而抚四夷。而在藏区，封建割据局面一方面促进了各教派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为各教派的发展树立了界限，阻碍了教派的进一步发展。各教派欲谋求发展，除了依附政治靠山以外，还要有经济实力强大的施主。蒙古族统治者皈依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萨迦派依附于蒙古帝国，二者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是为蒙藏宗教思想文化得以交流的经济背景。

文化背景。蒙古族的传统宗教是萨满教。萨满教的教义简陋而粗朴，由萨满教巫师口耳相传，外人很少知道。萨满教崇尚神通，其巫师有神通者，可赤脚在火上、刀刃上走。其宗教仪式也十分简单，主要是祭祀、驱鬼、治病、占卜等。其宗教功能主要是“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然而，伴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原有的萨满教文化已经不能与之匹配，或者更新，或者用另一种宗教思想文化代替萨满教文化，已势在必行。蒙古族统治者在征战过程中，也在不断寻求一种既能替代萨满教文化，又能适合自己胃口的新的宗教思想文化。但这里是有“分殊”的，成吉思汗对于寻找替代萨满教文化的意识并不强烈，也未提上日程。窝阔台汗则面临着选择的痛苦，贵由汗和蒙哥汗做了一种赌博式的尝试，忽必烈汗则最后做出抉择。在众多宗教思想文化中，选择了藏传佛教。这不仅因为蒙藏两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很

大的相似性，而且因为蒙藏两个民族的传统宗教也有很大的相似性，藏民族的传统宗教——苯教，其主要功能也是“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此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社会历史背景。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当时在以正统自居的汉族人士看来，蒙古族属于“夷”族。“夷”族欲统治中原，登上中原王朝皇位的宝座，这必然为许多汉族士人所不能容忍。因此，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稳定北方之际，先推崇利用新兴的全真道教，以减少中原方面的抵抗。同时也礼遇其他宗教，尤其是属于“夷”族的宗教。及北方既定，入主中原乃大势所趋之时，全真教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打击、限制全真教的发展便成了蒙古族统治者此时对待全真教的策略。因为全真教毕竟代表“正统”的汉族宗教，一些不服或不满蒙古族统治的汉族士人多避迹其间，时刻对蒙古族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急需扶植一种属于“自己”方面的宗教与之抗衡。蒙古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宗教教义粗朴而简陋，宗教仪式荒诞而单调，宗教功能乏味而残缺，宗教理论浅薄而庸俗，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之要求。藏传佛教则不然，佛教本身理论之深奥，教义之繁杂，戒律之齐全，功能之强大，不仅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佛教在藏土经过与苯教的碰撞、交流、冲突、融合，已经发展为藏传佛教。由于蒙藏两个民族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藏传佛教不仅适合藏民族，也同样适合蒙古族的精神生活需求。不仅如此，藏民族在以“正统”自居的许多汉族士人的眼里，同样在“夷”族之列。联合周边少数民族以御汉族，结交诸“夷”以抗华夏便成为当时蒙古族统治者的策略。于是乎佛道相争之焦点遂演变为“夷夏之辩”，辩论的结果与其说“夷狄”胜华夏，毋宁说王权克神权。因为“夷”之一方有强大的王权做后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蒙古族统治者选择了藏传佛教。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蒙古族统治者接受藏

传佛教，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背景。

## 二、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过程

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可分六期：成吉思汗时代为第一期；窝阔台与蒙哥时期为第二期；忽必烈时代为第三期；忽必烈以后至元朝灭亡为第四期；俺答汗与索南嘉措时期为第五期；清朝时期为第六期。

第一期。成吉思汗时代。藏传佛教已开始向蒙古族地区传播，但这种传播是非官方性的和非大规模的，只是一种局部的和浅层的。蒙古汗国在扩张过程中，曾一度面临对吐蕃的经略。成吉思汗之时，几次对西夏的征战和对印度用兵都曾兵临藏地边境，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是否发生战争，史料记载互有矛盾。《蒙古佛教史》中说：“火兔年（1207年），梵天法王博克达成吉思汗亲自派人从西藏的前藏到后藏去，与萨迦派的萨钦·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并从前后藏地方迎请佛像、佛经、佛塔，使得蒙古人对佛法获得坚固不坏的信仰。对佛法信奉和有持居士戒者出现，这是佛教在蒙古地方传播的开始。”<sup>①</sup>《青史》记载：“（成吉思汗）四十五岁，丙寅年（1206年）出征西藏。西藏的爱门部的诺颜朱加与呼和杜利等来迎，设宴奉献无数的礼物，并且奉献出阿里三部，卫藏四族，拉母三岳地方，其国全部降服。成吉思汗大喜，乃备仪礼致书与西藏萨迦派大喇嘛呼日和宁布说：‘早就想聘请喇嘛你，然而迄今因为政事俗务军事未能就绪，所以未能聘请。虽然这样，但是我愿在这里表示敬仰

<sup>①</sup>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之忱，恳你在那里伸出护佑之力，等待我的事业完成的时候，希望喇嘛你和你的弟子们一同幸临蒙古，传布佛教。’这虽然没有和那个喇嘛会面，但是已经从遥远的地方崇敬喇嘛。因此，免除西藏人民的徭役，敬奉卫藏三座及喇嘛和尚。这样以与呼和宁布喇嘛结缘为喇嘛施主，而成为佛教的大施主法王，敬奉三座。”<sup>①</sup>《蒙古源流》中说：“岁次丙寅年，（成吉思汗）四十五岁，用兵于土伯特之土鲁格多尔济汗。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颜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辘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汗嘉予之，遂大赉其汗及使臣而遣之。上因致书并赞贺于萨嘉察克罗咱斡阿难达噶尔贝喇嘛云：‘尼鲁呼诺颜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由是收服阿里三部属八十万土伯特人众。”<sup>②</sup>《蒙古政教史》中说：“火虎年，（成吉思汗）年四十五岁，抵卫藏。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吉等人来迎，设盛大宴会。奉献阿里三部和前后藏四翼及南康三罔之一切地方。成吉思汗遂遣使抵后藏，向萨迦派喇嘛贡噶宁布送去礼品，并致书曰：‘因还有一些军政事务未完，待其完结时，需要您和您的弟子来蒙古地区传布佛法。’成吉思汗虽然没有亲自会见他，但从很远的地方敬奉喇嘛。因此，免除了藏人的赋税，祀奉卫藏之三宝物和僧众，并对其广泛地供养。如是，成吉思汗成为佛教之施主和法王。”<sup>③</sup>《西藏画卷》中说：“1206年（火虎年），当西藏的头人们一知道成吉思汗的军事准

① 谢再善译注：《蒙古青史译注稿》，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0年，第30页。

② 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159页。

③ [清]耶喜巴勒登著，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6页。

备，就立即召集会议，商议如何应付这一危局。”<sup>①</sup>《安多政教史》中说：“霍尔成吉思汗抵藏，占领上区阿里以内地区，派遣使节至后藏，供奉礼品于萨迦贡噶宁布，遂成施共之缘。后复致函，陈述召请彼等赴蒙地之意，亦请去若干佛像、佛经、佛塔。”<sup>②</sup>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如《黄金史纲》、《如意宝树史》、《新红史》、《土观宗派源流》等也有类似的记述。通过以上记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成吉思汗之时，蒙藏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原因如下：其一，蒙藏之间没有世仇，成吉思汗之时所征讨的多是有世仇的地区，即使无世仇也曾得罪过蒙古军；其二，蒙藏之间如果发生战争，一些史料不可能忽略不记，诸如《蒙古秘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都无此记录；其三，蒙藏之间如果发生战争，不论胜败，都不可能不了了之。第二，成吉思汗之时，蒙古兵已经临近藏地，对藏地构成威胁，蒙藏之间已发生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原因如下：其一，藏地既与西夏接壤，又与印度毗邻，而成吉思汗曾几次攻打西夏，又用兵于印度东北境，兵临藏地已成事实。其二，各种史料所载成吉思汗与西藏的关系，确有年代和人物上的矛盾和记载上的重叠，有不足为据之一面，但因此而否定其史料的全部之价值，似乎有欠公允。其三，《蒙古秘史》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时有自兀笼格赤城来之撒儿塔兀勒（人），忽鲁木石氏之名牙刺哇赤，马思忽惕之父子二人，向成吉思合罕进言城邑管理体制。闻言知其如理，遂委其子马思忽惕，忽鲁木石，同俺答鲁合赤每共掌不合儿、薛米思坚、兀笼格赤、兀丹、乞思合儿、兀里羊、古先答邻

① [意大利]图齐：《西藏画卷》。

②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742页。